

战争语境中的激情内耗与异变： 路翎小说新探(1939—1949)

赵双花

(济宁学院中文系，山东曲阜，273155)

摘要：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文学充分呈现了战争形势下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路翎的小说堪称代表。但随着战事的推进与转移，其激情书写也在发生着变异。究其实，抗战期间，人物身上的激情特质具有严重的内耗倾向：于知识分子，体现为超越性的然而脆弱的孤独；于底层民众，体现为狂热而盲目的混沌。内战时期，作家侧重于讽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凸显阶级压迫及民众反抗，理性话语增强。追其原因，除了《讲话》精神向国统区的传播、渗透外，作家自身的思想贫弱也不容忽视，这种贫弱与少年时代的不幸、物质生活的困窘、婚恋生活的琐碎等因素密切相关。路翎小说的抒情异变，凸显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曲折，也彰显了作家不懈探索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路翎；战争；激情；内耗；异变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5)06-0146-06

亲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塑造世界的力量，都产生于激情。”^{[1](154)}而暴力的极端形式——战争则是激情的重要来源。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历了两场性质各异但规模浩大的战争，即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战争以无可匹敌的强力支配了民众的心理、情感乃至审美偏好，无可挽逆的精神重创与艰难的摸索蜿蜒并行于时代罅隙中，构成历史发展的另一主动脉。涌动其间的激情也因政治状况的复杂及作家个性的多元而歧形百出。与解放区、沦陷区文学相比，国统区文学尤其如此。

许多国统区作家注重呈现时代动乱中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以情取胜。尤其是青年作家路翎，自1939年写作的短篇小说《“要塞”退出以后》在胡风编辑的《七月》上刊载后，就开始引起文坛注意。他的小说积极实践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青春的祝福》《谷》《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底层矿工、士兵、农民、知识青年等人物形象极力与因袭守旧的传统、狭隘封闭的环境或自身重负的精神痼疾相搏斗，激情迸散，独具气象。这一审美性的现代主体构建以不可复制的独创性名留史册，而建国后牵连2000余人的胡风事件又为其添着了浓郁的悲壮色彩。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理群、

赵园、杨义、张新颖等学者均肯定了路翎激情书写的价值与意义^①，晚近，王德威甚至将其与毛泽东抒情美学相提并论^[2]，将路翎研究推至新境界。

但是，过度聚焦于这一抒情形态及其意义的探究，会轻忽路翎创作中的另一种重要现象：该激情的特质是孤独与混沌，内耗严重。以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为界，后期作品如《嘉陵江畔的传奇》《燃烧的荒地》抒情性减弱，阶级、革命等理性话语成为叙事主导。笔者认为，澄明激情内耗及异变的过程，探析战乱与个体思想局限对这一异变产生的影响，可厘清现代作家以文学想象国族未来的可能与难度，同时也有益于当今的思想文化建设。

一、路翎前期小说的激情内质： 孤独与混沌

以理论家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一方面延承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革命书写传统，另一方面更在意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精神灌注到创作实践中，也因之被研究者称为“左翼启蒙派”^[3]。但与左翼文学、五四新文学相比，七月派作家在追求民族解放的同时还要坚持

收稿日期：2015-06-25；修回日期：2015-10-3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可能与限度：抗战时期小说中的抒情问题研究”(14DWXJ0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主观战斗精神’的演绎与偏离：路翎现代小说研究”(J12WE66)

作者简介：赵双花(1980-)，女，河南南乐人，文学博士，济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以个体解放为出发点与归宿地，人物身上的激情正是二者相撞击的产物。在民族战争的钳制下，正是这种激情书写使作品获得了前代文学不曾有的新质。

在路翎以知识青年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中，字里行间弥漫着挥却不去的孤独感。路翎笔下的人物与狂人、魏连殳、于质夫、何彬、萧涧秋等五四青年有着共通的情感气质：孤独，因先觉、对抗而导致的孤独。他们在个体与集体、自由与专制抵牾中纠结、突围，内心反规训的解放欲求是激情迸发的基本促动力。被誉为“青春的史诗”^{[4](3)}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在理论家胡风看来，表现了“个性的受难和情绪的波澜，为新文学注入活的生命”^{[5](14)}。生性怯弱的长子蒋蔚祖以孤独抵御妻子的贪婪与泼辣，次子蒋少祖慕归“古中国的静穆”之前，在革命团体中并不合群，但由此滋生的“孤独感”却涂抹着“自由而神圣”的油彩。孤独是人物前进的力量，也是人之为人存在的确据。抗战伊始，三子蒋纯祖沿江徒步西迁，旷野流浪中的孤独感甚至获致了形而上的意义：

落雪的旷野，对于自觉孤独、恐惧孤独的年轻人是一种诱惑，这些年青人，是企图把自己底孤独推到一个更大的孤独里去，而获得安慰，获得对人对世底命运的彻底的认识的。^{[6](525)}

孤独即救赎，是将充满个体意志的自我与泯却个性的大众做有效区分的重要标志。只有在“更大的孤独”、更高更远的审视与批判中，才能彻底看清民族命运悲剧的实质。《蜗牛在荆棘上》中的士兵黄述泰虽来自乡间，却极具精英气质与个性意识，渴念摆脱世俗。他以返乡离婚的方式向众人昭示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形实具备的孤独感。《谷》中的知识青年林伟奇，在乡下中学因言辞激进、不服规训被视为异类，孤独异常，恋人的安慰也失了效用。说到底，孤独是一种现代性情绪，是诸神缺位之后，人为自己立法的伴生物，具有与传统决绝、与现状对抗的先锋性质与革命潜能。一旦迸发，便如水石相激，难以阻抑。

不过，孤独的另一面却是脆弱。蒋蔚祖的死去、蒋少祖的退守，以及蒋纯祖的彻底失败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蒋纯祖梦想“走向人民”，在武汉加入救亡演剧队，因爱惜自己的个性受到排挤。在四川乡场中学，渴望教育救国，却不被众人理解，精神觉醒反成了不堪重负的生命之累。蒋纯祖至死都认为自己是战斗者，是英雄，但也坦承一旦遭遇充满“僵硬和荒凉”的民众，便束手无策。在晦暗的镇公所，主事的乡绅念读黄述泰提交的离婚诉状，闲懒而马虎。英雄般的壮举在乡人眼里不过是闹剧，他恍然如置荒原。而林伟奇的被迫离开也恰恰说明了孤独实在难以抵挡群体的

攻讦。

孤独所蕴含的能量与脆弱实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路翎对人物命运结局的处理却显示了他在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尤其是鲁迅战斗精神时的不彻底性。《狂人日记》中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虽微弱却也划破了历史夜空。《孤独者》《伤逝》《在酒楼上》结尾处都有一条向前延伸的“路”。反观路翎，人物或死亡或甘心退守或不知所终，这无疑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新的政治情势下张扬个性主义的虚弱与失败。一心向外扩张的命运搏斗与不断内缩的生命潜能构成了南辕北辙的两极，体现了作家形塑现代主体的难度。

与青年知识分子的孤独不同，路翎笔下底层劳动人民身上的激情特质体现为混沌。《饥饿的郭素娥》中，郭素娥虽大胆挑战世俗，无视封建礼规，倾慕矿工张振山，但这只是情欲本能催逼下的反抗。现代理性的匮乏决定了她既不会有子君挣脱封建牢笼的勇气，更不会有莎菲审视异性的犀利目光。她到底未能摆脱鸦片鬼丈夫的淫威，受折磨而死。《罗大斗的一生》中，罗大斗在父亲的无度骄纵与母亲的恶毒鞭笞中长大，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博得势力阶层的好感。在乡场上，他阿Q似地欺软怕硬，谄媚权贵，毒打妻子也与母亲怄气，“狂热”而“混乱”的“热情”支配着他的行为。被抓做壮丁时，“狂热”转变为“空虚”“呆滞”。源于生理本能的激情若无现代理性做支撑，就无法凝定为澄明的生命智慧，人也只能是激情之奴，任其驱使，看似充满力量的追求也不过是无意义的盲从。

可见，在路翎笔下，无论是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底层民众都难以担当建构国家未来这一时代重任，或脆弱或混沌的激情最终使他们丧失了历史代言人的资格。对那些继续寻求的人们来讲，则必然皈依群体或向世俗低头。《青春的祝福》中的少女章华云供职于一家充斥着利益纠葛的教会医院，苦闷、孤独。最后，她选择了离开，对将溶于“无数的人”的未来充满想象。《人权》中的中学教员明和华自居思想启蒙者，但目睹校警毒打无辜乡人时却无能为力，最终认同世俗的权势力量。可以说，在路翎的前期创作中，已内含着自我否定的倾向。充满孤独与混沌的激情书写，最终将他与强调韧性战斗的鲁迅、与豪迈雄壮、睥睨一切的毛泽东区分开来。

二、路翎后期小说异变： 理性话语凸显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政治歧见日益加深，最终酿成三年内战。与共产党政权步步推进相匹配的是，解

放区文艺政策也开始大范围地向其他政治区域渗透,并最终成为文坛的主导范式。路翎此阶段的写作典型地见证了这一规范是如何强制性地或潜在地改变了现代文学发展格局。与沈从文转向玄思与象征、巴金停笔不同,路翎试图调和启蒙话语与革命、阶级话语之间的矛盾,但结果却是后者对前者的压抑与驱逐。

抗战甫一胜利,路翎即一反之前的深度拷问,描绘了各界人物庸俗势利的现实状况(《抗战胜利之后》)。遂即,开始以阶级的眼光、利益的标准切割人物身份、划分人物阵营、规定人物命运。《两个流浪汉》中,陈福安以杂耍为生,向往自由,受到歧视后选择了皈依阶级队伍,而不像《饥饿的郭素娥》中的张振山,在引领矿工暴动失败后远走高飞。《在铁链中》的农民何德祥因欠了霸主的债,被捕入狱。他即使身戴锁链,也不停咒骂与反抗。当妻子下跪向霸主求情时,他不仅不施以同情,反用碎瓦片砸妻子,恨其不争。《平原》中,乡下农民胡顺昌因不堪忍受沉重的军粮征收而离家出走,夫妻温情被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吏撕扯得粉碎。

讽刺是抒情的反面,是否定性理智的极致表达。战争后期,国民党治下相当黑暗,讽刺文学勃兴,路翎也加入其中。《爱民大会》中,官僚绅士随心所欲而不顾乡民死活,留美归来的政府议员建议召开爱民大会以收拢民心。住在破旧茅棚八十多岁的朱四娘,五个儿子都被拉去做壮丁,惨死沙场。他们决定表彰朱四娘,还特意邀请省主席前来观瞻。但朱四娘在主席台上反而振臂一呼,鼓动乡民报仇。这种未经共产党发动的革命书写,可能最终将路翎与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解放区作家区别开来。但这种近乎原生态的斗争反抗更能说明路翎叙事转向的自觉,在这些底层民众身上,生命强力不再源于个体性的生命原欲,而是来自集体性的、普遍性的物质困苦。

因此,人物进行实质性的斗争与反抗,是叙事逻辑的必然推衍。《嘉陵江畔的传奇》中,乡间生活困苦,人们决定去寺庙朝拜。率领这帮童男信女的是乡场的权势人物罗云汉,他一路上坑蒙拐骗,抢劫钱财,甚至置人于死地。民众实在看不过眼,将其用棍棒打死。这无疑说明了,要获得救赎,更重要的是以暴力反抗世俗的欺压而非寄托于泥塑菩萨。1948年完成的长篇《燃烧的荒地》更具代表性,叙述的是1942年发生于重庆乡场的阶级纠葛。位于嘉陵江岸边的村镇兴隆场,吴顺广集地主、厂长、矿主、县委委员等要职于一身,是实际的统治者。返乡者郭子龙在外流浪多年,当过兵痞,军官,发过财,抢过女人,但最终落魄潦倒。父辈留下的田产多被吴顺广霸占,他决定复

仇,要回土地,安居养老。与前期小说中的流浪者形象黄述泰、张振山相比,郭子龙已毫无狂妄、动荡的精神气质,厌倦漂泊,空虚无聊。他家以前的佃户张少清及其恋人何秀英与地主吴顺广有着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他曾经利用这一矛盾要挟吴顺广,获得了一点利益,遂浅尝辄止。而张少清却决定彻底发起暴动以对抗吴顺广的压榨,这激活了郭子龙的身份意识与斗争觉悟,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家族是依赖农民而活着的,“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富人们和统治者们,都是依赖着他们的奴隶和仆役而生活的!一旦失去了这些奴隶们,他们就会张慌失措起来。除了享乐和作恶以外,他们没有一点点生活的力量。”^{[7](304)}最终,走向了发动群众反抗地主的革命道路,一心要铲除人间黑暗,找到光明前途,他因为过于激动而猝死。但是这种死已经完全不同与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结局,而是有着“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的历史开创意义,其战斗口号依然在乡场上空余音袅袅。如果说解放区文学是正面歌颂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农民,那么路翎则是通过地主后代郭子龙的自身反省、忏悔与自我否定,而达到对农民的赞颂,可谓殊途同归。

路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书写,较之前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已与精英无缘,追名逐利,精神平庸。《泡沫》中,南京解放后,何季超作为接收大员,一心盘算如何凭借自己的政治资本让前女友回心转意。他原本很失意,寄居在表弟家。表弟一开始很鄙视他,听说他时来运转了,又好酒好菜招待他。《旅途》中的青年男女恋爱,与蒋纯祖精神至上的恋爱追求不同,何意冰与王洁芝一心追求丰裕的物质生活,彼此斤斤计较。《中国胜利之夜》中的大学生郝朴诚期待出国留学后能娶位外国太太,光宗耀祖。

关于这种激情退却、理性凸显的创作转变,路翎其实是有自知之明的,“在我逐渐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底精神常常地被迫着退却”。如果说以往作品中有波涛汹涌般的激情,此间却不过是“汹涌的波涛中的碎船底一片”,是一个“平庸的世界”!^{[8](206)}更多现实理性的介入,挤压了作家多元想象创作空间。虽然,整体上讲,路翎小说的语言文字还持有以往的风格,但叙事主题已经嬗变。路翎之所以成为路翎的独特性,正在无可挽拒地走向泯灭。

三、时代与个体双重限制下的写作困境

路翎创作之所以转向,外围影响是首要的。战争中,各方力量的角逐、文学中心的不断转移、文学生

产机制的变化以及党政力量的强势干预等都逼着作家不断转换自己的政治观、创作观，探索新的书写可能。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即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摘要的方式刊载了“讲话”的核心内容。周恩来同志也在重庆数次召开作家座谈会，传达、阐释解放区文艺精神，作为“文协”的骨干成员胡风也多次听讲并参与讨论。《财主底儿女们》初稿甫成，胡风便以极为出色的艺术敏感捕捉到了其中的政治气息，这是“一场沉重的战争，意识形态的和文学形象的战争”^{[4](6)}。而胡风们在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的应对、出击乃至最后的困兽犹斗都表明了20世纪40年代自由创作空间的逼仄与杂乱。中国现代文学也随着这场斗争的悲剧收尾而彻底地完成了“与中国现代启蒙主义写作的决裂”^[10]。文学中没有启蒙，显然也就失却了以个体觉醒为基准的抒情精神。

但是，对路翎创作异变原因的探求，若单执于考察外围因素，就会遗漏更有效的阐释角度。作为文学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作家自身的精神能量、思想资源显然更具决定性。毫无疑问，在七月派作家中，路翎最为努力地实践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主观战斗精神”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斗争向度：“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11](187)}。“批判”(发掘大众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与“结为一体”(与大众密切联合)并落实为“活生生的感性存在”，实际上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知识精英们必须主动打破和“闰土”们之间的“厚障壁”，必须对祥林嫂们提出的“灵魂”问题做果断回应，也必须对他们保持必要的耐心宽容。更重要的是，还要保持知识人的批判锐度与强度。俯仰自如需要更强劲的思想武装，蒋纯祖们的悲剧或正在于这种思想的贫弱，以及问题处理手段的僵硬化。于此，路翎颇为自知：“目前我们的民族战争陷在一个昏沉的平静里，……——文艺应该在这一阶段里更有力地武装自己。……现在，一切新的种子应该向更深广的现实层吸取养分而强健自己。”^{[12](18)}

不过，知、行之间的差距往往不可以道里计。据路翎讲，《财主底儿女们》初稿遗落，重写中，他加强了社会内容的表现分量，但作品的情感基调与表现倾向却没有更多变动，主旋律依然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底欢乐”^{[13](1)}。《儿女们》的再写作无疑是成功的，但并不能由此推衍出彼时路翎有

着较为系统的“思想的武装”。恰恰相反，在他20余年的生命中，思想的力量可能相当薄弱。《儿女们》的写就更多凭借了作家的命运经验与被压抑多年的生命激情。路翎说“它里面有着我底哭泣和我底喜悦”^{[12](36)}，“我也有一种理想主义，洗礼的，或生活底童年幸福，这是我把《儿子们》放到滚动的多面的生活里去之后发生的，它们底生活显得美，小孩底装束和喊叫使我幸福——这就是我底理想主义”^{[12](59)}(小说初名为《财主底儿子们》，引者注)。可见，路翎试水文学是源于内心早已涌动不息的理想与憧憬，是“力比多”、白日梦的艺术升华与再造。直到后来写作《青春的祝福》时，他对“人民形象追求的重要”这一重要的思想命题才有自觉的认识与要求。而对于在此之前完成的中篇，他做出的反省是，“里面又有那么多的‘？’，它们天天向我叫喊，要求解答；自然，我在解答，但稍一不慎，就滑开去，弄得天地昏茫，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里了。”^{[12](43)}(据前后信件内容以及作品完成时间推测，该中篇应指《饥饿的郭素娥》，引者注。)路翎是胡风的亲密跟随着，却跟随得相当辛苦。胡风要求作家有强壮的“思想的武装”，路翎却觉得“我们都是带着什么一种武装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迅速地破，又迅速地缝补。到了最后，恐怕就满身破烂地挂着残盔破甲了罢”^{[12](86)}。1945年，胡风创办《希望》，意气风发宣扬自己的文艺主张，但此时的路翎却接连去信表达自己的思想虚弱：“我久欲向谁表白我底庞杂的感情，我觉得，这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检讨，但总又收缩着。有时似乎枯涸了。”“目前用力是困难的，感觉被塞闭似的，总是不新鲜。”^{[12](90-91)}思想的苍白几成难以跨越的创作障碍，阻碍路翎在“主观战斗”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通畅。

这种贫弱与路翎的出身经历及成人后的家庭生活密不可分。路翎的少年时代非常不幸，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这个“拖油瓶”忍着世人的白眼再嫁求生。继父是基层公务员，是“精神上的赤贫者，有小情感：愤怒、暴躁和慨叹”。他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地度过的。……悲哀是那么不可分解地压着我底少年时代，压着我底恋爱”。中学时代，因参加学生活动而被校方开除。后来供职于四川一家煤矿，做会计。从小到大，路翎的生活离文学、阅读都很远。另外，成年后的路翎也过得相当酸辛。艰苦的战争年代，他虽和余英品尝到了爱情的甘甜与温润，物质困窘却始终如影随形，不断销蚀着幸福的色泽。他也为缺少真正的知音而向胡风发牢骚，“生活真是灰冷的，也没有能够和你相碰相击以激出火花来的人。”^{[12](114)}女儿的出生使路

翎有了短暂的初为人父的欢悦,但随即又堕入矛盾的深渊,“我确实担心我将被压毁。我并不觉得我是做了荒唐的事情的,因为我强烈地需要生活。但是,在这个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我有怀着大的赌注的辛辣的思想。”^{[12](101)}他一方面表示要大破大立地跟随时代^{[12](71)},另一方面却认为“生活得好,才是神圣的义务,我生活得一点也不好”^{[12](79)}。琐碎、平庸、困顿的家庭生活也磨损着路翎的创作热情,妨碍着思想的深入。

路翎小说中的情爱书写与他自身的婚恋生活存在着一定的互文关系。他笔下的男性渴望成为时代英雄,但他们的恋人均向往平庸、安逸的家庭生活,彼此隔膜。如《谷》中教师林伟奇因受排挤而决意离开时,他的恋人左莎却渴望他放弃理想,结婚成家。《儿女们》中,蒋纯祖与高韵、万同华间的爱恋也因理想分歧终止。《感情教育》中的宋子清希望启蒙、说服张蒲英,使其不耽于琐碎、无聊的日常生活。路翎在创作中如此纠结于两性间的理想分歧,无不是自身思想陷入困顿的反映。其实,早在1943年,路翎向胡风谈及婚事时,胡风就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担心你的精神是否受得起家庭生活的拖累。据我所看到的,在精神上,几乎没有成功的结婚。……我想,顶好的方式是朋友结婚,不住在一起,也不必取合法关系,……生活上双方不彼此拖累,且精神上可以竞走。当然,还有一种重要的事情:不能生孩子。”^{[5](28)}这是否是胡风自身的经验体会我们不得而知,但它确实表明了现代知识分子在个体微生活与宏大的事业理想之间的纠结与两难。路翎的选择非常明确,“似乎除了妥协之外别无出路”^{[12](87)}。

因此,路翎在思想、话语上逐渐靠拢《讲话》精神也顺理成章。建国前夕,路翎对文艺创作的阐释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生活道路、活的人生形象来对社会底封建势力和奴役势力进行斗争,在这里它尽着作为文化斗争的先锋的任务;有它底普及要求的这一面,即将它底思想要求通过对于旧的文化形式底占领而传达给大众。”^{[8](118)}对于文艺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认识看似与《讲话》精神还有着不小的分歧,但与路翎之前的文论话语相较,普及与提高这两个词汇却是首次出现。更值得注意的是,路翎开始像大多数作家一样自我否定,洗心革面,“我的一些原来用作对旧社会斗争的武器的东西,会慢慢失去了它们的作为武器的性能罢。到了阳光中,我身上的疮疤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对于过去我无所留恋,我希望在这伟大的时代中,我

能够更有力气追随着毛泽东的光辉的旗帜而前进,不再像过去追随得那么痛苦。”^{[8](213)}他对自己多表现国统区阴暗面而未正面歌颂解放区新社会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与愧疚。

四、结语

1939—1949年,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七月派作家路翎独出机杼,建构起真正能支撑起国家苦难、开拓未来的现代主体,人物身上四溢的激情即体现出这一历史潜力。但以孤独、混沌为特质的激情在时代与个体的双重困局中,不免如刀卷刃,如弓失箭,叙事转向政治理性,几成必然。就路翎创作中主观与客观书写的失衡,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还需要一段时间去真正认识中国。”^{[14](357)}(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者注)这不无道理。但让人遗憾的也许是,在匆匆向前的时代步履中,历史从来不给人从容遐思的时间。泥沙裹挟之下的幸存者能在疲弱奔命的同时,不甘放弃,艰难蜕变已属难能可贵。当今社会消费至上,娱乐至死,文化发展整体上趋于轻薄化、泡沫化、平庸化,路翎在痛苦中坚持、在坚持中追寻的文学行动于现实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注释:

- ① 参见钱理群:《探索者的得与失——路翎小说创作漫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3期;杨义:《路翎——灵魂奥秘的探索者》[J],《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张新颖:《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 乔治·奥威尔. 政治与文学[M]. 李存捧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 [2]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M]. 北京:三联书店, 2010.
- [3] 刘骥鹏. “左翼启蒙派文艺思潮”: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学语词[J]. 文学评论, 2009(2): 171-177.
- [4] 胡风. 财主底儿女们·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5] 胡风. 致路翎书信全编[M].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4.
- [6]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7] 路翎. 路翎文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 [8] 张业松. 路翎批评文集[M]. 珠海:珠海出版社, 1998.
- [9] 陈晓明. 《讲话》的方向与当代文学的断裂性革命——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启蒙传统的突变[J]. 文艺争鸣, 2007(12):

- 65-78.
- [10] 胡风. 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C]// 胡风全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路翎. 致胡风书信全编[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4.
- [12]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题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 [13] 赵园. 未完成的探索——路翎与外国文学[C]// 论小说十家.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7.

The new study on the internal consumption and its variation of pass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ar in Lu Ling's novels (1939—1949)

ZHAO Shuanghua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Jining College, Qufu 27315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40s, the literature in the KMT-controlled area showed fully the rich and complicated spiri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during the War, which boasted of strong lyricism. And Lu Ling's novels represented such spirit. But as the War went on, the writing of such passion changed. In fact, the passion was consumed by itself: such characters as intellectuals were full of severe loneliness, while masses of lower classes were blindly and innocently chaotic. During the 3rd Civil War, Lu Ling paid closer attention to satirizing KMT's oppressive rule, stressed class oppression and civil rebellion, and henc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rational discourse. Except for the spread and immersion of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Yan'an Forum on Art and Literature*,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 lay in the writers' weak mentality which was caused by their unfortunate experiences, poverty, and trivial marital life. This narrative evolution prov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was complicated, and Lu Ling's unremitting exploration was admirable.

Key Words: Lu Ling; the War; passion; internal consumption; variation

[编辑: 胡兴华]